

反革命两面派张国焘

于吉楠

张国焘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后来跑到国民党那里当特务去了。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途中，叛徒张国焘跳出来，分裂党和红军，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张国焘的路线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由于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

毛主席指出：“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剖析一下张国焘从假革命到反革命的历史，看看他是怎样搞机会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又是怎样垮台的；对于我们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深入揭批“四人帮”，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钻进革命营垒里的蛀虫

投机革命

张国焘原名张特立，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上栗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一九一六年秋，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探求真理的革命青年，而是一个野心勃勃、充满了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纨绔子弟。他家拥有数千亩土地，曾祖父官至道台，祖父做过翰林，父亲是一个“县太爷”。张国焘自己供认：“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这个所谓“诗书之家”，在上栗市称霸一方，世世代代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张国焘从小过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生活，是有名的“阔少爷”。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封建帝制

的崩溃，张国焘的家庭日趋没落，旧的科举道路走不通了，于是他就转入新式学校，去寻找通向飞黄腾达的途径。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前夜。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唤醒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山雨欲来风满楼”，新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北京大学是各种新旧思潮汇集和激烈斗争的场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在进行各自的宣传活动。张国焘象条游蛇，穿行其间，忽而赞同陈独秀鼓吹的科学民主，忽而标榜自己信仰社会主义，忽而狂热地追求无政府主义。然而，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却是巴枯宁。巴枯宁出身于俄国一个地主贵族家庭，曾经混进革命队伍，一八五一年被捕后向沙皇写了“忏悔书”，成为可耻叛徒，他疯狂反对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搞分裂，耍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从内部破坏革命。“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于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巴枯宁的思想和经历，对张国焘发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后来所走的道路，正是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巴枯宁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潮流蓬勃兴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张国焘混在爱国学生的队伍里，群众会上，街头巷尾，发表一些冠冕堂皇的演讲，到处大出风头。

六月三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可是，张国焘不信马列，同工农群众格格不入，经常和右派学生段锡朋等人鬼混在一起，往来奔走于梁启超等政客、名流，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之间，拉关系，找靠山，向上爬。张国焘奔波了几个月，没有能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不得不回到北大继续那枯燥无味的学生生活。

一九二〇年九月，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张国焘认为有机可乘，摇身一变，给自己贴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削尖脑袋钻了进去。接着，他趁李大钊同志外出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机会，骗取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窃踞了中央委员的职务，开始了投机革命的政治生涯。

鲁迅说过：“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张国焘这条钻进党内的蛀虫，一直干着“内里蛀空”的勾当，犯下了一桩又一桩的罪行。

机会主义的奇谈怪论

张国焘混进党内不久，就暴露了机会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一九二一年秋，党中央派张国焘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各地工会、群众团体的代表，张国焘是负责人之一。大会期间，列宁在病中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勉励中国工人阶级，要团结其他革命的阶级，领导革命前进。张国焘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对抗列宁的指示，不向代表团传达，还大搞宗派主义，几次声言不准非党人士参加会议，蓄意破坏革命团结。

张国焘这样干，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另有一套机会主义谬论。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张国焘在《响导》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的文章，和盘托出了他的黑货。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张国焘回答说：“我们的政治活动是要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在这里，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地主阶级不见了，反封建的农民土地革命任务被取消了。

那么，所谓的“民众的力量”又是谁呢？张国焘挖空心思地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作了一番“分析”，胡说什么“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近代工业虽然逐渐发展，但是欧美式的资本家简直只能在上海香港等处数出几个，所以资产阶级的势力还是很小。新式工人自然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的争斗；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的势力会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张国焘黑笔一挥，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地位，抹煞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工农群众不过是愚昧无知的“群氓”，只有“知识阶级”才是领导革命的“救世主”，“那时常被土匪杀戮，军阀蹂躏的农民，正等着知识阶级去率领他们出火坑；那些压迫在外国人之下的上海唐山等地的工人们，现在是不断的向他们呼救”呢！

张国焘别有用心地抬出所谓“知识阶级”，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五四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向前迈进的时候，张国焘却把五四运动后“走上错的道路”、“消沉得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救世主”，这不仅是赤裸裸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也是张国焘的狂妄政治野心的暴露。其实，想充当“救世主”的正是张国焘自己。

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张国焘也精心设计好了。他不是说“青年土耳其党怎样恢复土耳其的独立”，“使我们奋发”，“中国革命是会得到土耳其一样的胜利”吗？他所要建立的“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就是已经破产了的土耳其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张国焘发出这些胡言乱语并不奇怪，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从来一窍不通，只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后院垃圾堆上的一只鸡。

工人运动的绊脚石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积极发展全国的工人运动。张国焘窃取了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职务，俨然以“工人运动的领袖”自居，指手画脚，神气活现。但是，他一不深入工人群众，二不领导工人斗争，完全是一派大少爷作风。他脱离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际，鼓吹什么“联络感情”、“改良生活”、“增高知识”、“实行互助”一类空话，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列宁说：“什么叫工贼呢？这就是同战斗的无产阶级有联系但在共同斗争中又绊它腿的人。”张国焘就是这样的人。

一九二二年，在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各地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到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安源大罢工，先后取得了一百多次罢工斗争的胜利。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十分震惊，九月，上海工部局悍然下令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李启汉被捕入狱。张国焘贪生怕死，慌忙从上海跑到北京，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交给邓中夏同志去办，自己躲进秘密住所，发出一阵阵反对革命的哀鸣。

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政变，推翻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蔡和森同志发表文章，号召革命人民支持孙中山重建广东革命政府。张国焘却哀叹：“广州最靠近香港，英国侵略者握住广东的咽喉，把持广东的经济命脉，英国海军几个小时内便可占据广州；福建被日本势力包围着，和广东的形势毫无两样。在这样英日势力威压之下，如何能组织一个自由活动的革命政府，完成他为自由和独立而革命的任务呢？”并且污蔑人民群众“只有要求改良的动机，还没有真正觉悟革命之必要”。相反，他对标榜“保护劳工”的吴佩孚，抱有很大幻想，鼓吹同吴佩孚拉关系以发展工人运动。

一九二三年一月底，党中央派张国焘去郑州出席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面前，吴佩孚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禁止开会。二月一日，郑州全城戒严，反动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工人代表不畏强暴，高举红旗，从五州大旅馆整队出发，走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反动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这时，有个别投机分子受吴佩孚的软化，奴颜卑膝地说：“吴大帅说郑州是军事要地，叫我们不要开，那我们就不要开吧，要给吴大帅留点面子啊！”张国焘乘机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叫嚷“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不必坚持”，妄图压工人代表屈服。张国焘的叛卖行径，立即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怒斥道：“工人联合起来，成立工会，闹革命，还得给吴佩孚留点面子吗？怕什么敌人说我们是‘过激分子’，我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工人联合起来，就是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争取解放。”他坚决地说：“大会一定要照开，谁说个‘不’字，

谁就是工贼，我们要同他拚。”工人们群情激愤，奋不顾身，冲破封锁线，闯进普乐园会场，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欢呼声，震撼屋宇。

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总工会由郑州移到江岸办公，张国焘也跟着窜到了汉口。二月七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罢工工人实行血腥屠杀，江岸一地工人死三十多人，伤二百多人，林祥谦同志宁死不屈，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关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通电全国，声讨军阀吴佩孚的罪行，并领导长沙两万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也宣布举行同情罢工，继续坚持斗争。抗议军阀暴行的声浪，遍及全国。

可是，张国焘在反革命的屠杀面前，吓得浑身发抖，又一次现出了机会主义者的原形。他不顾广大工人的死活，连夜逃之夭夭。

以“左”的面目出现，反对国共合作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教训，加快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步伐。张国焘惊魂稍定，又跳出来反对国共合作，充当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早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时，张国焘就反对国共合作。这次大会后，他利用职权，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组织内，拉山头，搞宗派，煽动一些人反对国共合作，进行反党小组织活动，气焰十分嚣张。因此，党中央召开会议，再一次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严肃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张国焘的干扰、破坏，搞乱了党内的思想，许多人对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使国共合作实际上不能实行。

张国焘以“左”的面目出现，反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反动谬论，是同托洛茨基主义一脉相承的。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否定农民的革命性和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他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胡说中国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更为恶劣、更为反动，因此，不是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是与它直接斗争。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党人时，曾经深刻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一九二三年春，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把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更

加迫切地提到议程上来。毛泽东同志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要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党必须联合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力量，结成一个革命联盟。为了排除机会主义的干扰，正式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一九二三年七月，在广州召开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名代表，围绕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议一开始，陈独秀就抛出一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他污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攻击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竭力吹嘘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人。他认为，目前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要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了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到资本主义大发展后，无产阶级再进行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因此，他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同陈独秀相反，张国焘以“左”的面目出现，反对国共合作。他胡说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的，国民党根本不能进行民主革命；因此，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民主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使我们党变成黄色。他鼓吹我们党专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陈独秀和张国焘的谬论，遭到代表们的普遍反对，整个会场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

面对这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尖锐地驳斥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正确地分析了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基础上实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他强调指出，陈独秀和张国焘不懂得中国国情，中国产业工人少，农民占了大多数，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只有工人和农民才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人；在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一些跟着张国焘跑的人也转变了；陈独秀完全陷于孤立；张国焘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偷偷溜出了会场。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从狗洞里爬出来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告了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在新的形势下，工人运动走向复兴，农民运动也开始发展起来，我们党的力量和政治影响日益扩大。

但是，张国焘逆历史的潮流而动，还在继续搞他的只注意工人运动，不准农民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为了对抗国共合作，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公开发表文章，鼓吹同无政府党合作，说什么“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

“三大”以后，张国焘在党中央机关混不下去了，跑到北京，想方设法要把铁路工会抓到手。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窃取了总干事职务。

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极端仇视，他们加紧策划镇压革命。直系军阀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北京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运动”，大造反动舆论。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三日，湖北督军肖耀南以所谓“此间过激党秉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派遣党徒，分往内地”为借口，在武汉逮捕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六人。杨德甫被捕后，在伪军法处，投降敌人，出卖了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机关和负责人，成为可耻叛徒。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王怀庆出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北京达教胡同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抓走了张国焘等五人。事件发生后，我们党立即展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响导》周报连续发表《告劳动平民和青年学生》、《北京之党狱》等文章，声讨北洋军阀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暴行，并展开营救活动。

敌人的监狱和法庭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个被捕的人。一些被捕的同志坚持革命立场，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可是，张国焘这个投机革命的软骨虫，却在伪警察局里，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在敌人的军法审讯面前，他浑身筛糠，供出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北方工人运动的机密情况。王怀庆看了张国焘的供词后，将原定死刑，改判监禁，保留了他的性命。由于叛徒们的出卖，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也在石家庄被捕。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郑州和胶济路各地的工会负责人，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四十多人。我们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会，遭到了一次严重的大破坏。

九月十八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联合奉系军阀，发动北京政变，赶跑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我们党利用这个机会，设法从北京等地监狱中救出“二七”以来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张国焘从监狱里出来后，重新钻进党内，用“革命”的伪装来掩盖叛徒的真面目，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

（待续）

一九七七年第六期重要更正

第13页倒8行“矛盾双”后应加“方”字；第17页21行应为“惩前毖后”；第31页倒1行应为“四人帮”；第41页3行应为“社会主义”；第42页倒11行应为“耸人听闻”；第46页17行应为“炼钢”；第47页24行“三百多台”应为“六百多台”；第53页标题第2行汉语拼音“fùndòu”应为“féndòu”；第61页2行应为“蒋介石”。特此更正。